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新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318 字数206,000 开本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9\frac{3}{8}$ 插页2

1959年6月北京第1版 195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册

定价(4) 0.97元

前言

春秋戰國是我國歷史上經濟文化發生巨大變革的時代，決定的因素在於生產工具、生產方式的改變。大約在春秋的中叶，一般的生產工具，尤其是農具，已經較普遍地用鐵鑄成了。『國語：齊語』裏就有這樣的記載：『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闌，試諸壤土。』『美金』就是青銅，用它鑄兵器；『惡金』就指的是鐵，用它鑄農具。到了春秋的後半期，晉國就已用鐵鑄刑鼎（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可見鑄鐵的技術到那時已經相當進步了。

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一般過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第一卷，第三四一頁，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由於生產工具的改變，西周末以至東周這一時期，農業生產力顯著提高，手工業也因有了比較堅固和銳利的工具而迅速進步，影響到商業在諸侯各國間較廣泛的發展。因而土地所有制也發生了變化。公田制遭到破壞，農村裏出現了不同於領主的地主階級以及有土與少地或無地的農民階級。宗法制也發生了動搖，家族制代之而起。從此遂形成諸侯、卿大夫兼併的局面，產生了世卿的官僚制度。所以在這一時期內，諸侯各國的

戰爭、締和或朝聘、會盟，卿大夫之間的互相勾結或彼此傾軋的情事，顯得空前的頻繁。這些事實，由各國史官記錄下來，就積累了豐富的史料，經過史家的整理，而後成『國語』一書，它繼承着歷史散文的傳統，並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這期間由於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的急遽改變，社會上階級的變化很大，反映階級意識的各種思想派別都已在這一時期產生了萌芽，為戰國時代百家爭鳴準備了條件，所以緊跟在歷史散文發展的後面，哲學散文也空前地發展起來了。在『國語』這一部書裏，除了體現歷史散文的進展之外，在它的思想方面，也與當時到以後的哲學思想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和一定程度的影響；從這些發展與過渡中，就可以衡定『國語』一書的價值。

『國語』二十一篇，分別記載周、魯、齊、晉、鄭、楚、吳、越等八國的事蹟，從周穆王記敘起，到魯悼公止，共歷五百餘年。『周語』裏從西周的穆王到東周的敬王，中間的厲、宣、幽、惠、襄、定、簡、靈、景等朝，都有記載，比較全面；『鄭語』記西周末事；其它各國之語記的都是春秋這個階段的史實，與『左氏傳』同樣地結束到三家分晉。宋、衛、秦各國，在『國語』裏雖說沒有專篇，却也有小部分的材料散見在有些關涉的其它各語中，如在『晉語』裏就穿插着一些有關秦國的記載。在春秋時，大小的『諸侯』還有一百多個國家，較大的有十幾國，而這些史料就都來自若干部落兼併後的幾個大國，所以這一時期主要的大國互爭霸權的史實和它們所標榜的『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張，都已作為重點地反映在『國語』裏了。

西漢以來，大多數的人都認為『國語』和『左傳』同是孔子的弟子左丘明的作品，因此在漢、唐兩代都有把『左傳』叫做『內傳』，『國語』叫做『外傳』的。後來也有些人懷疑這個說法。異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們今天一般的意見是：『國語』可能是各國史乘的原始記載，也許經過當時史家（假定他便是左丘明）的整理——作為史料的整理，基本上還保存着各國史乘的本來面目；不過詳略去取之間有些更動罷了。

說它是經史家整理過的史料，我們也可以從『國語』記載的內容得到一些線索。所載八國之語，只有『周語』，因為總算是天下的共主，所採摭的範圍應該較廣些，所以它這部分的材料也比較全面而闕略；其餘各國的史料都比較地是集中或偏重在某幾個人物和事蹟的上面。如『魯語』對臧文仲、里革以至公父文伯之母等人的記載較多，『齊語』只記管仲相桓公的政治和外交上的措施；『晉語』的大部分材料也都是關於重耳走國與霸天下的史蹟，下面便著重地記敘着范文子、叔向、趙簡子幾個人的事；『鄭語』僅載史伯論天下興衰的話，『楚語』只著重記靈王、昭王二君；『吳語』只取夫差不從申胥之諫，『越語』只取勾踐能用文種、范蠡之謀；這些重點都是特別突出與明顯的。倘若不是經過史家的刪存，任何一國的史料也不會像這樣的簡括而集中。

史家在整理史料的時候，往往想集中某一部分材料去解釋某一個問題，剪裁刪汰和重點突出的結果，便自然在若干部分中都形成它自具的重心，這是可以理解的。它既經過史家在紛雜的材料中有規劃、有目的地摭取，又經過改編和潤色，有一定程度的系統性，所以我們覺得『國語』還不是自然散

佚而偶然餘存的一部分殘缺不完的史料，大約也因此才爲後世一些人認做它也是左丘明的一部著作的吧？

毛主席指示我們說：『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對於人民羣衆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導他們向後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六七九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三月北京一版）這對我們今天整理研究古代典籍來說，是無比重要的先決問題。我們一面要實事求是地肯定了那些豐富的、燦爛的文化遺產的精華部分，一面也要對那些糟粕的、帶有毒素的部分予以批判。然後才能夠正確地從古代文化吸收到營養，以豐富並發展今天的新文化。在這個原則下選註古代的典籍，除了對它們的思想和藝術性進行科學的分析批判外，還要掃除古今文字間形音義的隔閡，做一些普及工作，目的仍然是要做到古爲今用，不應該抱殘守闕。『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毛主席所指示的是再明

確也不過的了。

『國語』一書，我們雖說不相信它是左丘明一人所作，也不管左氏是否孔子的弟子；但它的整理者的思想却是基本上屬於儒家的。從它對歷史材料的甄選和論述中，看出它帶有像儒家所標榜的『民本』、『忠恕』、『崇禮』、『正名』、『天命』、『綱常』等思想。

『民爲邦本』的主張是儒家思想中比較有些進步意義的一面，這種主張的啓蒙思想表現在『國語』的記敘裏是屢見不鮮的。如：曹劌對魯莊公說：『惠本而後民歸之志』，伍舉對楚靈王說：『安民以爲樂，……今君爲此台也，……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門且批評令尹子常說：『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這些都還是以民爲重的。又如芮良夫論榮夷公好專利，雖說指的是周厲王時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也在申論着君與民的關係；邵公諫厲王所說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也流露着『國人』——盡管它還不同於人民——的願望。這些也應該部分地予以肯定。當然，在這些論述中，它的出發點都是爲統治者着想的，正也是民本思想的不徹底處，我們又不可以把它們提得過高。譬如里革對魯成公說，臣殺其君，是君之過，這樣對國君的衝撞是大膽的，也帶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性和革命性；但是他在下面仍然說：『君也者，民之川澤也』，用水去比喻君，用魚來比喻民，意思仍在說明民必須仰仗着君才能够生存。這是儒家民本思想的精義，它是有局限性的。可是在這些地方到底把民強調一下，就比較地有些進步意義了。

還有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國語』在記述中，往往或有意或無意地批判暴露了階級對立的矛盾，

反映了當日的現實生活。如單襄公和邵桓公談論到邵至的時候，說起的『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就清楚地記下了民間的流行語，表明白出階級的矛盾。又如鬥且提起楚國的社會情況是：『民之羸餒，日已甚矣，四境盈壘，道殣相望』，也較深刻地說出當日被壓榨的人民在戰爭與苛政交迫之下求生不得的生活現實。這些地方，不但是歷史記載中的真實的資料，就文學的領域說，也是有較強的感染力的。

另一方面，『國語』裏屬於落後意識的東西也很不少。如：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因為拘於禮法，把悼念丈夫和兒子的感情截成兩段，幾乎有些不近人情。孔子却稱贊說：『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這一類的記載是迂腐可笑的。又如伯陽父論地震，劉文公、萇弘、欒城周，都在闡論着天命，宣揚那些神權迷信的思想，給統治階級做辯護，找理論的根據。這些篇章，就其思想內容說都是沒有價值的。再如：邵公以其子代宣王死，荀息殉君，鉏麇觸槐等，都是奴隸社會裏臣僕對奴隸主盡愚忠的材料，史家用表揚的方式記敘着，就為後來儒家的『君為臣綱』思想之所本。所有這些落後的部分，都是應該予以批判的。『國語』里大部分都借着記敘一些足資利用的史實，闡發着儒家的思想，它的整理者的傾向性從這裏可見一斑。我們對這些材料，以如何分析批判儒家思想的原則為準繩去處理它們，就大致不差了。

但是儒家思想並沒有支配了『國語』的全部材料，因為它基本上還保留着各國史乘的本來面目，當時儒家思想也並沒有像後世那樣地定於一尊，史料的整理者也不可能全部給它改變。因此，散見在

各語中的一部分材料也還有溢出儒家思想範疇以外的。如公父文伯之母所說的一段話：『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強調勞動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頗有進步的意義，是值得我們肯定的；同時這又是後來墨家一部分思想的萌芽了。齊桓公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拉攏天下的諸侯，『諸侯之使，垂囊而入，捆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公子繁勸秦穆公立公子夷吾爲晉君，說：『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史伯給鄭桓公出主意說：『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像這些事例，都是運用權謀詐術，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又是後來法家思想的淵源所自了。『越語』記范蠡事，從前到後，貫穿着述近道家的思想，分明是一個陰謀家的形象。對這些接近法家與道家 and 儒家思想大相逕庭的『慘礫少恩』的史實，原書在記敘或議論中並沒有顯示出對它的非議，只管客觀地記敘着，或者還把它們做爲正確的策略去渲染鼓吹着，可見原執筆者的思想是並不囿於儒家的一隅之見的。

由於『齊語』論霸術，與『管子』相終始，近於法家；『越語』下篇尙陰柔，持盈定傾，頗類道家之言，都不合於儒術。這樣，就跟孔子弟子左丘明作『國語』的主張有些說不下去了。爲了找另外的理由，所以前人多有疑『齊語』大約是已經全部散佚了，後人採取『管子：小匡篇』的內容把它補

上的；又說『越語』的下篇或許是『漢書：藝文志』所載『兵權謀十三家』裏面的『范蠡』二篇」據入的。我們現在既認爲『國語』是一部分經過整理的史料，這些考證問題就不是如何重要的了。

柳宗元作『非國語』，有些地方很能够發人深省，是可以參閱的。如『里革更書逐莒太子僕』章，柳氏非之云：『里革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爲善？公之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奸臣更之，則何如？』這樣的挑剔是有理由的。『魯語』載此事，只顧表彰里革是一個直臣，宣公能够從諫，似乎只理會用儒家的『忠恕』爲題在那裏作文章了，却没有從制度上銓衡一下，竟全面地肯定下來；具見史家在思想意識上是有偏蔽的。又如『鉏麇觸槐』章，非之曰：『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這對史家執筆時的態度說，也有指摘的餘地。儘管所記的是事實，但這裏除客觀地記述外，史家是在表明對這件事的看法的。史家的原意是只偏重于寫出趙宣子因爲忠敬而免於一死，想借着這一個偶然的事例向天下後世說教，以宣揚忠敬之道的。但它到底不能服人之心，所以柳氏提出異議來了；他當然不是反駁這一件史實，而是批評史家的思想和態度。

也有些地方，柳氏只提出一般的見解，仍然需要我們今天再深入地考慮的。如『桓公霸諸侯』章，柳氏不同意原來的記載說：『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貪強忌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耶，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己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示

霸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爲桓公之霸，不如是之弊也。」所駁斥的也有一部分的理由。但我們今天又有進一步的了解：春秋時代的爭霸，互爲盟主，是大國迫使小國納貢，用和平的方式進行的掠奪。桓公暫時行些小惠，用威脅利誘的種種方法謀取霸權，「以利交」不過是釣鈎上的魚餌罷了。從這裏，我們又可以了解『叔向論務德無爭先』章，晉、楚在宋國舉行的弭兵大會上，爲什麼要爭爲盟主的道理了。再說，大國掠奪小國，受災難的自然是人民，正如鄭國子產所說的『用幣必百兩（輛），百兩必千人』（『左傳』昭公十年），小國人民的負擔是極重的。從此我們也可以領悟到當時造成『室如懸磬，野無青草』的主要原因，又是什麼。

另外，柳氏非難『國語』，多數是從反鬼神、天命等立論的。如『單襄公知晉將有亂』章，『非曰：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謫耶？』他反對察言觀行，可以預卜吉凶。『劉康公聘魯』章，『非曰：秦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耶？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耶？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登年載壽之數，如之何而準？』他不相信預能推定事二君或三君之數。『叔向之母知食我必滅宗』章，『非曰：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王孫說請勿賜公孫僑如』章，『非曰：且夫惡叔孫者，秦侈貪陵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他反對迷信，也不相信相人之術。這些駁議都是鞭辟近裏的。『國語』裏有許多章都強調這種不合乎科學的預見，在篇末還一定要記明這些預見都準確地實現了。這樣安排的

目的在於用那種特定的因果關係證明那些愚妄的天命、吉凶等觀念的正確性。這些都是在當日歷史的偏見之下產生的史觀，當然是應該批判的。『劉文公與荑弘欲城周』章，柳氏下了斷案說：『若夫當身速及之說，巫之無恆者之言也；追爲之耳。』就這方面的材料說，古史是頗近於巫的。古時太史兼掌星曆，正如司馬遷所說的『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因此迷信的說法，也成爲那時史觀的主要內容之一。

綜上所述，可見『國語』一書，除了它的內容對後世研究那一階段的歷史提供一些較可靠的資料外，從思想上說，雖也有一部分帶有進步性，有意或無意地批判暴露了現實，但它仍然是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的，也就是說應該批判的地方委實不少。不過從它的形式上說，在散文的發展史上却有較重要的價值。我國古代的歷史散文保存到今天的，當然要從『尚書』說起。它除掉後世僞託的部分，餘下的就量說已不很多，內容多屬天命貞卜之辭，雜以文告，簡略樸素，質而不文。孔子的『春秋』，雖說創立了編年體，有了系統，比較『尚書』前進了一步；不過文句也失之過簡，只可說是歷史記載的一個綱目。那些『微言大義』，多半出於後世經師的揣測；王安石曾說『春秋』不過是『斷爛朝報』，雖不免有些苛刻，却也表示出他不像別人那樣地崇拜偶像。在這些歷史記載的基礎上，發展到『國語』、『左傳』，歷史散文才顯示出長足的進步。這時期的歷史散文和表現哲學思想的散文，一時蓬勃地發展起來，幾乎壓倒了較爲先進的詩歌。這原因在前面已經談過，由於生產工具的改變，社會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就要求適於表達實用功能的散文形式，它才應運而突飛猛進地發展起來了。

『尚書』和『春秋』的兩大特色：尚實錄，寓褒貶，在『國語』裏都很好地保存下來。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又都比較地縝密和生動了，能够把當時的政治情況作較完整的敘述，把人物性格也刻畫得栩栩如生，通過史家愛或憎的感情把它們分別美化或醜化起來，使讀者受到較強烈的感染。如『里革更書逐莒太子僕』、『里革論君之過』兩章，都從一些對話裏描畫出里革骨梗抗上的性格；『臧文仲如齊告糴』章也從輾轉對話裏介紹出一個忠國事、恤民生的卿大夫的形象。『周語』裏記邵桓公轉述卻至自己誇功的那些言談行徑，活畫出一個自銜自媒的小人的醜惡面目。『晉語』裏記優施陵使驪姬在獻公面前構陷申生，也出色地運用細膩而深刻的描寫，援情度理地摹寫出口蜜腹劍的驪姬的聲容笑貌，並且從側面顯示着優施毒辣的陰謀。裏面又配搭上一個『中立』的里克，前既怕狼，後又怕虎，筆下把一個彷徨不安的渺小的心靈也寫得維妙維肖。這些都是在形象描寫的同時，把史家對那些正反面人物的褒貶寄寓在裏面了。

在敘事中，史家提出自己的斷案（如在篇末寫着『君子曰』如何如何，又如『齊語』、『吳語』之末，稱贊桓公、勾踐能够聽從群臣的謀畫，遂能成功），或是引用別人的評語（如引孔子、子夏的話贊美公父文伯之母），明白表示褒貶的地方是不多的。往往在一面記敘史實的過程中，一面已經把對它的贊同或反對的意見不露痕迹地表達出來了。如記晉獻公立奚齊爲世子以後，寫出『國無公族』，記趙襄子守晉陽時，寫着『沈寵生蛙，民無叛意』。都不需要對前者再加什麼褒辭，對後者再加什麼褒辭，史家的執向執背已經很清楚地交代給讀者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在許多章節中，我們細心

地覆案一下，都可以揣摩出史家的意向來。多半依靠形象的描寫，不論於概念化，「國語」在運用表達方法上，是比較成功的。

因為古時有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的說法，又見「國語」多爲記言，「左傳」多爲記事，所以也有人認爲「國語」是右史所書，「左傳」是左史所記。我們今天雖不必當真就相信這種後世的臆測之辭，機械地把它們分開，却不妨把「國語」和「左傳」相互參看，領會一下「國語」記言的特點，較多地注意它的語言藝術和表達方法。我們只要稍稍留心，就會發現「國語」裏所載的朝聘、饗宴、諷諫、辯詰、應對之辭，邏輯性都是很嚴密的。並且在對話中時時結合人物的性格、身分和處境來表現，顯得頗爲真實而生動。篇中往往出現一些警策，言詞也很精鍊。這些實例，不消多舉了。

又因爲「國語」這個記言的特點，它把「尚書」以當時的口語行文這一歷史散文的優良傳統保全下來了，並且發展了它。顯而易見的是語助字能够充分地運用了，還利用它達成記敘上生動活潑和富於形象性的資佐。在先秦時「國語」在運用接近口語的散文寫作方法上就已有了很大的成就，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總之，「國語」表現人物情節的手法是高妙的，變化多方的，把人物写得形象而有個性，把故事情節寫得蕩蕩相生，合情入理。同時，通過這些生動的描寫，把史家的思想與史觀都滲透到裏面而借着藝術的語言表達出來。我們覺得這些表現方法直接影響了後世的史家，司馬遷的「史記」不但在史

料上有一部分依據着它，連描述史實與歷史人物的手法也是它和『左傳』的繼承與發展。惟其如此，就結成了史籍與文學的不解之緣，以史爲鑑的說服目的之下就恒常地伴有感染的魅力；儘管是歷史的典籍，在另一個角度去看，却也是文學的名著了。

今本『國語』二十一卷，和『漢書·藝文志』所記載的相同。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考，卷數『互有增減，蓋偶然分併，非有異同』，大約今日的通行本和漢代的傳本不致有多大出入；諸書引文偶而有些不同處，可能由於傳寫之誤。

『國語』比較早的各家注本，現在只存韋昭『國語解』一種。在它的原叙中提到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各家的注本，現在都已經亡佚了。汪遠孫有『國語三君注輯存』四卷，在諸書中輯得賈、虞、唐三君的注釋若干條，還附有王肅、孔晁二人之注。既已不是全豹，只可供參考罷了。

現存的『國語』基本上有兩種刊本。一種是宋明道二年取天聖七年印本重刊，叫做『天聖明道本』，清嘉慶年間，黃丕烈把這種宋刊本的影寫本刊於『士禮居叢書』內，後來有些印本就是依此翻刻的。一種是宋宋庠『國語補音』本，庠字公序，所以叫做『公序本』；明張一鯤刊本，澤遠堂刊本和清孔傳鐸（衍聖公）刊本等都依據此本。這兩種刊本——明道本和公序本——的正文和注語都頗有異文，許多人做過校勘。黃丕烈『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札記序』云：『『國語』自宋公序取官私十五本校定爲『補音』，世盛行之，後來重刻，無不用以爲祖。有未經其手，如此明道二年本者，乃不

絕如綫而已。……至於勝公序本者，文句煩簡，偏旁增省，隨在皆是。既有此本，自當尋案而得，苟非難憚，不復悉數矣。」黃氏重雕此本，並附『札記』一卷，對善本『國語』的流傳是有功績的。一般地說，明道本是比較要好得多，但有的地方似乎公序本又好些，我們不必太拘泥了。

韋昭的『國語解』言簡意賅，往往一語破的。著重在疏導文義，溝通今古，有時候援引些古史的記載，都很簡明精當。當然，它也存在着一些缺點，正如吳會祺『國語韋解補正叙』裏所說：『惜其於故訓尙疏，不及東京諸儒遠甚。故其中遷就舊文，以附己說者，所在多有。』他對韋解補正的地方，也頗有精到的見解；不過也有一部分不一定合適的，因為見仁見智，不見得都能够考慮得周到。

這一本『國語選』編寫的目的，是要給初學古典文學的人一些方便，志在普及，所以著重在篇章字句的注釋，有時還加一些照原文翻譯式的順解。旁及史事的地方也有些，只能簡略扼要地寫幾句。我們雖不信從內外傳的說法，可是『國語』和『左傳』確實有許多章節可以互相發明，至少應該彼此參考；因此在二書有關聯的地方，就注出『左傳』的年數。

注釋基本上依據韋氏解，另外也參照董增齡『國語正義』，汪遠孫『國語發正』，王引之『經義述聞』、『經傳釋詞』，黃模『國語補章』和吳會祺『國語韋解補正』等，在各家注釋裏面選擇一個比較妥切的說法，用現代語言把它解釋清楚。前人無注的，也多有增補。卑之無甚高論，只求沒有遺漏罷了。爲了節省讀者的心力，凡有疏解，只擇取一家之言，不多羅列，以醒眉目。除非遇到兩種解釋各有長短，不容偏廢時，才兼存其說。也有偏查諸家注釋，都感到與本文尙有距離，就試出淺見，俾與

目錄

前言

周語

祭公諫征犬戎

王孫說請勿賜叔孫僑如

邵公諫厲王弭謗

單襄公論卻至佻天之功

芮良夫論榮夷公好專利

單襄公知晉將有亂

陽人不服晉侯

單襄公諫鑄大錢

王孫滿觀秦師

劉文公與莫弘欲城周

劉康公聘魯

魯語

曹劌問戰

匠師慶諫莊公丹楹刻桷

目

錄

夏父展諫宗婦觀哀姜用幣……………四〇

臧文仲如齊告糴……………四二

展禽使乙喜犒師……………四三

臧文仲請賞重館人……………四四

里革更書逐莒太子僕……………四六

子叔聲伯辭邑……………四七

里革論君之過……………四五

齊語

季文子論妾馬……………五〇

襄公如楚……………五二

季冶致祿……………五三

公父文伯之母對康子問……………五五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五六

公父文伯之母方續論勞逸……………五七

孔子論楷矢……………五九

晉語

管仲對桓公以霸術……………六二

管仲教桓公親鄰國……………七九

桓公霸諸侯……………八〇

史蘇論驪姬必亂晉……………八三

優施教驪姬譖申生……………八六

申生伐東山狄……………九〇

申生被譖以至于死……………九三

宮之奇知虞將亡……………九六

里克殺奚齊秦立惠公……………一〇一